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陈漱渝 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

鲁迅

风波

L U X U N F E N G B O

陈漱渝 /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鲁迅风波

陈漱渝 编

陈漱渝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风波/陈漱渝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1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ISBN 7-80094-129-9

I. 鲁…

II. 陈…

III. ①鲁迅-人物研究

②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I 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62 号

鲁迅风波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华北石油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39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094-129-9/I·62

定价:22.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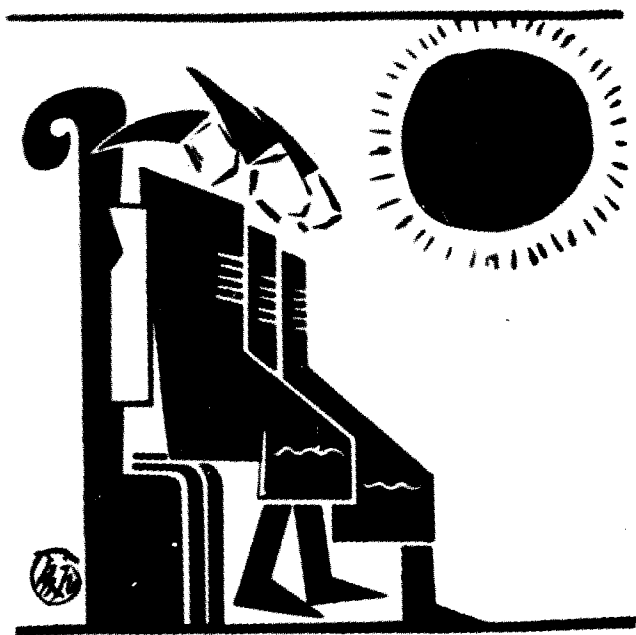
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84040746







返 書 徯 徯



1926年8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

——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

陈漱渝

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心目中,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有的学者宽心地说:“鲁迅作品已经进入经典,无须任何人来保卫。”

何谓“经典”(canon)?据我理解,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作品中长存在读者记忆中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它垂范后世,但却为数有限;它并非流行,但却比流行更为久远。每次重读,都会感到历久弥新。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在经典与读者之间,也经常进行互动。

毫无疑义,经典的构成有其相对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成为经典有其客观的标准,如内容的真善美,形式的不可重复性,思想的穿透力,对历史进程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但经典又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长期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挑战和重新审视。在这种再选择的过程中,伪经典将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却经过冲击和磨砺而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

都会面临诸多挑战。

从 80 年代中期至今,鲁迅研究也遭遇到多方面的冲击,其中有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流传到中国之后发生了严重变形的后现代主义,那些制造“断裂”、扬言要一脚踢开鲁迅的新生代、后新生代,还有质疑国民性理论、把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曲解为殖民话语霸权的“新左派”……这些思潮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颠覆鲁迅的“完美风暴”(这是借用沃尔夫冈·彼德森执导的一部好莱坞大片的片名)。不同个人挑战鲁迅的方式也不同,其中有学理式的,也有流氓式的。最近在鲁迅研究领域掀起的一场风波,是由 2000 年 3 月 25 日出版的《收获》文学杂志第二期引发的。

《收获》2000 年第 2 期引发的风波

在这期《收获》开辟的“走进鲁迅”专栏中刊登了三篇文章: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

冯骥才认为,鲁迅的“功”表现在他的小说选择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即国民性批判。“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眼光穿透国民性,在当时有意义,在目前仍然有深刻的意义。”鲁迅的“过”在于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即所谓“东方主义”。这些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意的或非难的,在他们对国民性批判的背后隐藏着一幅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而鲁迅的作品却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

在王朔看来,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现在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所以他要对鲁迅来一番解构。你说鲁迅是

革命家吗？他说鲁迅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逮谁跟谁急，专跟小人斗。你说鲁迅是思想家吗？他跟他的朋友却认为鲁迅的思想实际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不能给国家民族指道；特别是晚年被苏联蒙了，误认为那儿是王道乐土。你说鲁迅是文学家吗？他却认为鲁迅也没有更多的优秀作品。短篇小说有好有坏——失败的作品中包括鲁迅为新文学奠基的《狂人日记》和享誉全球的《阿Q正传》；特别是没有长篇，因而成不了文豪。王朔说，一个正经作家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经过他这一番拆卸，鲁迅就变成了什么都不是。

在我的记忆中，林语堂追思鲁迅的文章主要有四篇。最早的一篇《鲁迅》写于1928年，原文是英文，译成中文后发表在1929年出版的《北新》杂志3卷1期。林语堂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了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经历，并把鲁迅比喻为“白象”——象多为灰色，白象因而显得难能可贵。在《两地书》中，“小白象”成为许广平对鲁迅的昵称。《忆鲁迅》和《记周氏兄弟》两篇，是林语堂晚年在台湾写的。《收获》选发的《悼鲁迅》一文，是林语堂1936年11月22日客居纽约时写的，次年发表于《宇宙风》杂志。这时林语堂跟鲁迅的关系已经由“相得”恶化为“疏离”。他在这篇文章中将鲁迅定位为“战士”，这是对的，但却抹杀了鲁迅战斗的原则性与严肃性。他用游戏笔墨为鲁迅画像，把鲁迅描绘成“无名火发，无名兴叹，不交锋则不乐”的堂·吉珂德式的人物，好像鲁迅是在为交锋而交锋。

《收获》杂志关于鲁迅的这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在鲁迅故乡浙江绍兴引起极大反响。5月22日，绍兴市政协委员、绍兴市作家协会主席朱振国以会员身份致函中国作家协会，愤而予以批驳，并大声质问：如此“集束炸弹”贬损鲁迅意欲何为？这封公开信认为：“概括《收获》上的三文，可以说冯骥才的开篇是‘点

穴’，王朔卖点是‘抹粪’，林语堂压卷是‘漫画像’。”他进一步指出：“对待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伟人，我们需要保持明智的心态，宗师、奠基人、开先河者，有其不完美是难免的，但他们的历史地位永远是不可动摇的。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地下不可能辩护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收获》杂志封面上赫然打着‘巴金主编’，我们知道巴老是崇敬鲁迅的，他在1983年来绍参观鲁迅纪念馆时，留下了‘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的题词。读者迷惘的是：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文章结尾，朱振国要求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刊出这封公开信并作出复示。

朱振国的文章首先刊登在《绍兴日报》，接着，在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支持下，新华社就此事发了消息，题为《贬损鲁迅引起作家朱振国质疑》。有些报纸也就此事刊发了专讯，如《中国青年报》消息的标题为：“绍兴作协主席质问《收获》：贬损鲁迅，意欲何为”。6月1日上午，绍兴市鲁迅研究会、绍兴市作协、绍兴市文联、绍兴市社科联的有关人士还召开了“反对贬损鲁迅座谈会”。与会者表示：“作为鲁迅故乡的文学和社科工作者，我们有职责、有义务捍卫鲁迅精神，让鲁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对于朱振国的文章，《收获》杂志的副主编肖元敏、程永新作出了强烈反映。程永新、肖元敏答《绍兴日报》《劳动报》记者问的标题分别为《走近鲁迅，用心良苦》，《走近鲁迅，何错之有》。

程永新答辩的要点是：近年来社会上对鲁迅的议论很多，《收获》开辟的“走近鲁迅”专栏是开放型的，接受各种声音，从各种角度观察、感受鲁迅。编辑的初衷是让熟悉鲁迅的老一辈人

和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从各个角度、多方位地论述鲁迅先生,使读者走近一个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的鲁迅。冯骥才、林语堂,包括一贯口无遮拦的王朔,都是在肯定鲁迅的大前提下展开讨论的,而且,态度也是诚恳的。肖元敏也答辩说:“鲁迅是人不是神,大家都有权评说。至于我们杂志社,本身不发表观点,只是提供一个舞台,让作家讨论,让读者议论。有多种声音,并不见得是坏事。”

中国作家协会并没有对朱振国的公开信公开表态,而只是在6月10日出版的机关报——《文艺报》“作家论坛周刊”开辟了专栏。在“鲁迅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代表”的大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召开“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会”的消息,题为《鲁迅的革命精神不容亵渎》。另一篇是《文艺报》记者金盾采访陈漱渝的访谈录,题为《要想跨越他,首先要继承他》。这篇谈话的要点是:一,从1999年底刮起的一股“批鲁风”,实际上是1998年文坛“断裂”事件的延伸和继续。如果不认真研究导致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并加以妥善解决,而单就鲁迅论鲁迅,那就会纠缠不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鲁迅并不是不允许批评的。就连对鲁迅评价最高的毛泽东,也多次谈到鲁迅的弱点和局限性。所谓“贬损鲁迅”,并不包括对鲁迅历史局限性的科学分析,更不包括鲁迅研究领域的不同学术见解,而是专指那种背离事实和学理,一心颠覆鲁迅的噪音。三,对前人不要抹杀,而要跨越。但跨越前人,又首先要继承他。如果把鲁迅当作绊脚石踢开,恐怕只会伤了自己的筋骨。

《收获》第二期“走近鲁迅”专栏刊登的三篇文章,在社会上的不同层面引起了不同的议论:

一,关于“保卫鲁迅”的提法。一些学者对“捍卫鲁迅”的姿态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应该用平常心来对待批评鲁迅的声

音。“我们不是皇帝，没有压制别人的理由，命令别人的资格。不能有人不喜欢鲁迅就火冒三丈，就想叫我们国家制定一个不准说鲁迅坏话的法令。”把批评鲁迅的做法称之为“贬损”，是过去阶级斗争时期的心态和眼光，体现出一种话语霸权。另一些学者认为，所谓“保卫鲁迅”，是指维护鲁迅的正确方面，即仗义执言。鲁迅生前也曾为他的老师章太炎，他的朋友刘半农，他的追随者胡风、巴金、黄源辩诬，维护他们的正确方面。当鲁迅被曲解、被丑化时，有人据实澄清，据理反驳，属于“正当防卫”。“贬”是贬低，“损”是损害，这并不是阶级斗争时期的专用名词。

二，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有人说，鲁迅研究是一个学术问题。“尊重鲁迅是你的权利，不尊重鲁迅是他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是伟大的，就认为他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天然享有特殊政治保护权和特殊名誉保护权。不能一听人家对鲁迅说了一些不同意见，就怀疑人家的动机，以为人家有什么政治目的，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在政治上轻易怀疑别人的动机，是非常时代才有的阴暗心理。”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并不是对鲁迅发表一些不同意见就会成为政治问题，但目前对鲁迅的贬损却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情绪。鲁迅去世已经六十四年，还难以摆脱毁誉交加的境地，争来争去，说到底，是争“现在”，争“活人”的事情。“当前有人不敢正视现实人生的实际问题，便把目光转移到鲁迅身上，企图通过鲁迅来发泄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和现实人物的不满。”比如说鲁迅为专制所利用，成为扼杀自由思想的工具，等等，就无异于“对着和尚骂秃驴”。争夺对鲁迅著作的诠释权，反映的正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之争。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对鲁迅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对一个中华民族旷古耀今的伟大作家进行评价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乃至几代

中国先进的文化人思想发展道路的评价问题；说到底，是坚持还是放弃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问题。

三，如何遏制贬损鲁迅的思潮。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思潮是因为目前禁区太多，造成了人们的心理逆反；同时，鲁迅研究界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俄罗斯人并没有因为列宁赞扬过托尔斯泰就说托尔斯泰的坏话，因为那里人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包括对待列宁，尽可不必说话绕弯子。在目前的鲁迅研究领域，还有不切实际的拔高以维护完美的情况。有的研究者习惯于在鲁迅的光辉与深刻方面不断加码，成为了一种潜在的造神趋向。这样就会在有意无意之间造成了鲁迅跟当代读者的隔膜。另一种意见是，当前由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国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种形式，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当前存在的错误思潮有种种表现，如移植多党制，提倡私有化，丑化党的领袖，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诬蔑革命专政，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鼓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等等。诋毁和丑化五四以来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咒骂鲁迅，抬高其对立面，也是这股错误思潮中泛起的泡沫。因此，应该根据新形势、新特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应该加强鲁迅研究自身的学术建设，以对面临的种种挑战作出有力的学理回应。

《收获》风波引起的不同意见，有些并不是截然对立、互相排斥的，而是能够相通互补；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通过切磋逐渐扩大共识。比如，发表上述不同见解的人，尽管分歧明显，但几乎都不在学理层面上支持冯骥才、王朔的意见，都表示肯定鲁迅的历史地位，甚至都对鲁迅怀有崇敬之情。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看到了鲁迅研究的乐观前景。

关于冯骥才、王朔谈鲁迅的两篇文章

冯骥才是一位有才华的当代作家，我毫不怀疑他对鲁迅的

崇敬之情。但是他的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既是对鲁迅文本的误读，也是对后殖民理论的误用。

冯骥才的文章直截了当地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也就是说，阿Q及其子孙的劣根性并不是他们所固有的，而是用西方传教士的价值标准观察和评价的结果。鲁迅是在按照西方人东方主义的眼光诊断中华民族的精神杂症，客观上印证了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

什么叫做“东方主义”？按照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9年纽约文特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解释，这是西方人出于对东方的无知和偏见而建构出来的一种“东方神话”。在这些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等恶习，另一方面又具有“香格里拉”般的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创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如果鲁迅果真上了东方主义的当，那么他在客观上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帮凶。

在鲁迅著作中，国民性与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是同义词，主要指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特质和由此形成的特有民族性格、民族风采、民族情调。国民性是一种相对于个性(Personality)的概念，它代表了该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先天生理因素和后天精神气质，但绝非代表该族群中的所有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曾经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A. H. Smith, 1845—1932)《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也受到了该书日文译者涩江保的影响，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有着更为深广的中外文化渊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此外，鲁迅对待史密斯的著作始终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他一

方面指出《中国人气质》一书“错误亦多”(1933年10月27日致陶亢德信),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人“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

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产生的社会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当时先进中国人拯救民族危机的迫切愿望。举世公认,在明代以前中国的科技和国力曾经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也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即使清王朝建立之后,还出现过中国历史上可以傲视汉唐的康乾盛世。但后来由于闭关锁国,昧于时世,整个官僚机构骄奢淫逸,贪污成风,由政治腐败而造成军事懈怠,武备废弛,到18世纪末已由盛世转为衰败,到19世纪中期更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相继失败之后,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通过武装起义推翻冥顽不灵的清王朝,另一方面又从国人本身的弱点思考中国屡战屡败的原因。梁启超率先提倡“新民说”,指出“新其政”必须“新其民”。他还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反对“自讳其耻”(见1897年9月26日《时务报》第40册),以改变“民气散而不聚,民心独而不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的状况。梁启超还写过《呵旁观者文》,指出“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这跟鲁迅揭露的“看客”现象是一致的。

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明显影响的还有他的老师章太炎——这一点鲁迅研究界此前似乎研究得不太充分。比如,许寿裳《回忆鲁迅》一文(收入《我所认识的鲁迅》)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是他们在留

日时期诊断中国国民性病根所得出的结论性意见。“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是两个冷僻的成语。它们的出处在哪里呢？经过我跟我的学生林敏洁共同研究，发现这两个成语出自章太炎的一篇文章《印度中兴之望》，载民国四十年10月25日在东京出版的《民报》第17号。在这篇文章中，太炎先生将佛国印度跟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指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即诈伪无耻，缩朒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显然，在太炎先生指出的这六种精神痼疾中，鲁迅认为最严重的是一和六这两种。诈伪无耻即互相欺诈，也就是目前仍要大力治理的信用污染，这是缺乏“诚”的表现。猜疑相贼是指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这是缺乏“爱”的表现。不过，太炎先生是希望通过弘扬佛法来疗治上述精神痼疾，而鲁迅则认为疗治灵魂的有效手段莫过于文艺。

日本思想界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早在明治维新初期，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就已经开始探究国家兴亡与国民素质之间的有机联系。鲁迅在弘文学院求学期间，该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就跟中国学者杨度围绕国民性问题进行过对谈，必然引起正在思考同一问题的鲁迅的关注。鲁迅在作品中，还曾提到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鹤见祐辅、厨川白村对他的影响。他十分敬重厨川白村“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的“霹雳手”精神，认为“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鲁迅之所以译介厨川白村的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就是因为这本书中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也可以疗治同病的中国人，正如同奎宁（金鸡纳霜）可以治日本的疟疾，即也能医治国人的疟疾一样（参阅《出了象牙塔》后记）。对于日本人歪曲中国国民性的言论，鲁迅也义正辞严予以批驳。比如，安冈秀夫把江浙人大吃竹笋曲解为